

“流水”六十年

李 冰

在我的生命之中，75 个年头已成过去之际，我不免做了一番回顾，并接受了同志们的敦促，写了如下的一篇自述，但没有接受称之为“风雨六十年”的建议。这不过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一篇一生“流水账”，所以还是叫做“流水六十年”吧。

在我从业 60 年的漫长岁月之中，没有什么个人轰轰烈烈的场面，也没有什么消沉退缩的时候。千千万万个日日夜夜不停地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什么在支持着我？直到我将要离开岗位的时候，我才开始思索这一问题。我



李冰同志近照

像一般的那些年代投身革命的人们一样，没有什么个人“升官发财”的动机；也像他们一样，有些奋斗救亡的热情与决心。但是，贯串一生的恒久的动力，自然不可能得之于一时一事。经过了革命队伍中几十年间绵绵不断的培养和锻炼、挫折与考验，才渐渐明白：持久的动力只能来自实践与生活本身。我希望我的“流水账”能够说明这一点。

—

在我的幼年时期，我的父亲就参加了革命并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国民党不停的搜捕，他到处东躲西藏。对于白色恐怖，我们从孩提时期就印

象深刻，并自然地种下了对国民党的仇恨和对社会的不满，从小就知道父亲参加的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过好日子而奋斗的党。父亲一直是被通缉的“要犯”，我们多年不知其生死存亡，却不时从当时报纸看到他被捕被杀的消息。只是因为祖父在当地还有些名望，家庭尚能勉强生活下去。我们上小学时，家长的名字不是李克农，而是祖父的名字。经济上依靠祖父的积蓄和母亲做小学教员来维持温饱。随着我们长大，生活也愈来愈困难，也愈靠借债典当度日。书不能读下去了，我姐姐高中只读一年，就去找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大弟也被送去当学徒。

母亲考虑到家庭供不起我升学，初中毕业后让我去考了美国教会在安徽芜湖办的弋矶山医院护校，因其可以4年管吃管住，毕业后有文凭，也易找工作，但进护校要交50块银元的保证金。现在印象仍很深刻的是，母亲为此到处借债，当掉她稍微值钱的东西及衣服。幸亏当时外婆家情况略好，我才考进了护校，录取名次还排在前边。当我离家去护校，母亲含泪送我时说：“以后的日子靠你自己了，不管怎样要坚持，将来一定要做个‘有出息’的人”。从读小学到中学，母亲常用“有出息”来要求我们，所以读书时非常拼命。学校离家很远，都是天未亮即离家，中午靠带去的锅巴做午餐。我与姐姐每学期都是前三名，可以免交学费，略减家庭负担。那时在“凄风苦雨”的困苦生活中，母亲为供养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二

1936年是我离开家庭，进入医院护校，亦即进入社会的第一年。当时我刚16岁，从未离开过家，对社会根本不了解。从小生长在那样的家庭中，突然进入洋人办的，又是教会性质的洋地方，从院长到教员及职工，不少是美国人，且都是基督徒。我这个非教徒，还有三四个非教徒同学被歧视是必然的。为了不被歧视甚至落得被除名的下场，我们几个人商量，还是跟着他们去做礼拜，参加各种教会活动。但由于是被迫的，所以也当然不是那么虔诚。虽然闭着眼睛，但心中并没有想着上帝的圣经，只是为了争取能顺利毕业，将来可以找到工作。在工作和学习方面则非常努力，小心翼翼，逐渐得到好评，考试成绩也优良。于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也就逐渐习惯下来了。现在深深体会到，一个安逸而无负担的生活环境，加上

宗教的熏陶，又无经常性的家庭教诲，是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尤其是在青少年时代。

谁知好景不长。1938年，即我进入护校两年时，日本人占领了我的家乡。美国人及其眷属和一些高级医护人员纷纷逃离芜湖。我们全家也逃回原籍巢县的乡下暂避。由于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美尚未宣战，当时我们医院在长江下游是较大而有名的教会医院，日本人一时未来进驻。医院又占地较大，不少难民、教徒都纷纷躲进医院，找空地搭棚子暂住。母亲临逃离芜湖时与我商量，认为目前医院还是安全的，能坚持再学两年拿到文凭，将来找工作也容易，所以要我继续留下学习，两年间和家人简直完全不通音信。两年的敌占区生活，虽然未直接受到日本人的迫害，但对无行动自由的亡国奴生活还是有体会的。不能随便离开医院的大门，若出去必须向日本人鞠躬，低声下气地接受盘查，所以轻易不出大门。如此闭塞的生活，直到1940年毕业。我们班原来招生时30人，到毕业时只剩下4个同学，非教徒只有我一人。记得第一次拿到薪水时我大哭一场。因为家人无信息，我也无处可去。而医院当时因大批人员不断离去，很需要工作人员，所以我们班上4人都被要求留下工作，薪水也增加了些。可是有了薪水不能帮助母亲，心中也很不安。当时，由于日军不断推进，母亲带着家人也在逃难，根本无法与我联系，也是怕联系了对我不利。由于当时还存在着“国共合作”，父亲已有了消息，所以母亲领着一家老少，步行找到武汉父亲处。以后随着日军进逼，又跟着八路军办事处转移到湖南、贵州与广西。在武汉时，父母决定将我姐姐及两个弟弟送到延安学习。这时我还一个人留在芜湖。除了怀念家人就是一味努力工作，所以很快被提为手术室护士长。我当时也不敢在兵慌马乱之中独自远行，所以也只好安心等待着。

1940年经历了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大变动，它决定了我20岁以后的人生方向。平静安逸、收入较多的护士生活一下子就宣告结束了。这时日美关系渐趋紧张，渐渐临近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人由过去的不予干预变为不时来医院巡视，日本人的重病患者也不时送来治疗。医院人心惶惶，能有办法的都陆续离去，院长及其他美国人也在撤离。最后只剩下几位年老的美国医生和护士长，医疗工作只不过是维持而已。可是我们到哪儿去呢？心里一时惶惶无主。

意想不到的事突然来临了。有一天，医院办公室的中国主任找到他的办公室去，神情紧张地问我的家事，并问我的原名是否叫“李双凤”。他说日本人来医院调查了两次，两次询问芜湖共产党人李克农的女儿据说在医院工作。由于我进护校时已改名“李静彬”，家长是祖父李哲卿，当时院长只答应调查。第二次日本人又来催问，院长就劝我赶快离开，美国人也怕日本来找麻烦。可是生活到 20 岁，还从未离开过家乡，火车都未坐过，现在也不知家人在何处。我投奔何方呢？急得我整天只有哭泣，有的同事家在上海，想帮我到上海暂避。

真是上天保佑。很快有一天，两个陌生人来医院找我，完全是一般老百姓的装束。他们说，我母亲派他们来接我去上海，并给了我路费。他们还告诉我到上海车站有人来接我，并交待了如何找到接我的人。正好此时，有一个家在上海的大夫要回去探亲，于是我便与他一道，匆匆忙忙登上从未坐过的火车离开了芜湖。到了上海，来接我的是我父亲同一时期的共产党人，我小时常到我家的一位“伯伯”。他说他们很担心我被日本人抓走，所以急急忙忙将我接出来了，并说是我母亲离开芜湖时托付他们照顾我的，可是两年多以来，在芜湖他们从未与我接触过。我幼小时所见到的这些人，与我父母同时从事地下工作时的风貌毕竟还能忆起一些。他们都是默默无闻，却又最无私无畏的人。至今我对这样的地下工作者还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默默地、不顾一切危险地奉献着，有些就在敌人阵营而不为人知，或是受着严酷的困苦和冤屈，家庭也受尽牵连不能翻身。我是幸运者，又有什么艰难委屈不能愉快克服呢？这也是我几十年来的一种动力，是自我斗争中战胜自己的力量。

在上海住了两个月，等待机会到“大后方”去找父母。当时，我父亲任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但由于日军已侵入云南，滇缅公路已被封闭无法通过，地下工作者只好将我送到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某处等待机会。大约一个月后，在香港集中了 8 个青年，其中只有我一个女的，还有彭湃的儿子和一些海外华侨中的地下工作者们。又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神通广大，在日本及国民党的严密检查下，从香港经过九龙，偷渡到广东的淡水，经惠阳而入内地。沿途也有人接应，十分紧张地在敌区中钻来钻去，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时是坐小船晚上走，白天则停止隐蔽；有时则坐在自行车的货架上，称为“二等车”。我们又害怕、又兴奋，第一

次尝到了“干革命”的味道。因为都是青年，常不能掩饰内心的兴奋而忘情地大声说话或唱歌，受到带队同志的不断警告。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昼夜行走，终于到了广西桂林。我被送到父母亲处，其他同志被安排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直至到达延安才陆续见了面，有的到前线去了。这是我进入革命队伍的开始。在这几个月中，对党的上识加深了，立志革命的决心开始打下了一些基础。

我在桂林办事处等待安排。父母考虑我有护校文凭，可以留在桂林找个作为掩护，留在广西工作。后来又想利用我党与桂系李宗仁及白崇禧的关系，让我进广西医学院学习。经过“关系”的交涉，广西医学院已同意我入学，只等待办入学手续了。我也很高兴，可以进大学了。可是命运总是不断在变化。突然间‘皖南事变’爆发了，我的‘大学梦’也破灭了。父母亲考虑我在桂林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留在桂林，要我随办事处的同志先行，经重庆到延安去。这样，我又离开父母，随同志们离开桂林，乘军用卡车经过贵阳到重庆。贵阳一带都是山路，公路建设也不好，来往军车很多。我与一个女同志同坐在卡车的货物上。我们坐的车在一次转弯时与国民党的运盐车相撞，国民党的车翻入深谷。当时，我们看到卡车轮子四处飞，盐也都散了，坐在上面的人据说都死了，而我们也差一点翻车。当时开车的是一位华侨，也吓得要命。带队的同志命令他不要停留，赶快开车跑掉，否则被后面的国民党车抓住必被扣留。于是车行一夜未停，次日在一小镇，找一个简陋的小旅馆休息了一夜。这是我有生以来，更是参加革命以后第一次差点丧命，所以记忆至今清楚。

到了重庆后，住在办事处的招待所，地址在红岩办事处附近，周围有不少国民党特务机关在监视我方活动，有的特务还明目张胆地在办事处及招待所门前来回走动，若我方人员外出，他们一定跟踪。当我们到达重庆后，即被传授一旦被跟踪如何甩掉他们的办法，我感到十分新奇。我的二叔当时在重庆工作，也不是什么秘密处所，所以组织上同意我去看望他，结果遭到跟踪。我也在与他们兜圈子时把他们甩掉了，感到非常兴奋；不过组织上再不许我到其他地方去，又感到很失望。

在重庆初次见到周总理夫妇，并受到他们长辈式的爱护与关怀。当时我父亲还在桂林，他们多次叫我去看他们，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虽然你是革命的后代，可是并没有经过革命的艰苦考验，如果只凭一时的热情

与兴奋，而没有立志下大决心的思想准备是不行的。又说，你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生活比较优裕，有没有吃苦甚至牺牲的思想准备？你要考虑啊！当时自己还正在兴奋之中，当然回答得十分干脆。其实当时自己对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认识得并不深刻，但由于对周总理这样的革命前辈和自己父母的敬爱和感情，所以后来每逢遇到困难时，总会想起他们的教导以及自己所作的承诺，这些恐怕也应算做日后“动力”的一个来源吧！

1940年底到1941年初，当时“国共合作”已濒于完全破裂，各地办事处都被撤销，形势极其紧张。周总理及我的父亲已处在对方严密监视之下，但仍紧张工作，安排日后的长期斗争。同志们随时有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大家紧密团结、准备战斗到最后的牺牲精神，使我这个初入革命之门的青年受到很大的教育与鼓舞，并曾向人表示，很想留下来坚持斗争。当时我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已达十分高涨的程度。组织和父母立即给我以教育，凭一时热情参加革命的青年，如不认真加深对革命的认识，热情一过，遇到挫折就必然是退缩消极。我的幸运之处在于，我总是及时地受到这些教导。我想，这或许是日后工作中较少产生动摇的原因之一。

从重庆撤退到延安，是与父母、小弟以及办事处部分同志在一起的。我的父亲当时仍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少将秘书长”。我们一行三辆大卡车打着“奉命撤回”的旗子向延安撤退。“国统区”只有周总理及重庆办事处的部分同志了。这时，内战已迫在眉睫，沿途碉堡林立，岗哨如毛。当我们一行走到陕西潼关时，突然间，被几挺机枪阻住了，并缴了我们的枪，扣留了人员和物资，人人受到了盘查，形势十分紧张。我父亲悄悄对大家说：“我们有可能被扣押，要有思想准备进集中营”。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惊险场面。由于不久前受到过一些教育，这一次并未感到突然，反而觉得是面临考验而心情兴奋。

毕竟此时国共尚未正式破裂。延安党中央及周总理紧急交涉之后，我们受到的一天两夜的扣留结束，改为“押解出境”。一路之上，大家既高兴，又怕再度被扣，所以加快速度疾驶延安。记得抵达边区时，远远看到披着老羊皮袄的我方岗哨们都跳起来了，几乎跳坏了车厢底板。对我来说，这是真正进入革命的边区，且第一次亲身经历惊险场面，所以50多年之后还记忆犹新。

当我们全家回到延安后不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我们到毛主席住

处吃饭时，毛主席对我父亲说：“你们是冤家路窄，我们怕你们回不来了”（因为驻守潼关的最大特务是在我父亲手上吃过大亏，并遭蒋介石申斥的徐恩曾），毛主席还开玩笑地问我：“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人？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过去，我对父亲的工作确不十分了解，他也从不向我们谈及自己的工作经历，我也从不敢随便打听，只是在以后很久才渐渐知道，他原来是多年以来，一直活跃在“白区”甚至国民党首脑机关内部的一支“特殊部队”的总指挥官。同时，我也渐渐听到其中一些无名英雄们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都极大地激励着我。

三

新的生活开始了。1941年春到了延安，从城市来到了群山环抱的黄土高原。清澈的延河傍城而过，层层窑洞依山排列，晚间看来很像是灯火辉煌的高楼林立。神态愉快、意气风发的一群群年轻人活跃在各个山沟之中。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也尚未开展大生产运动，所以生活艰苦，吃的是小米土豆与瓜菜黑豆。我记得第一次吃小米饭，在口中转来转去就是咽不下去，只好用水冲下去。住的是又黑又凉的土炕，晚上点的是用小瓶自制的煤油灯。第二天起床，每人的鼻孔都是黑的。这样的生活对我们这群来自城市的青年是够苦的，但奇怪的是当时大家从未叫过苦，相反个个快乐异常，尤其是夕阳西下时的延河边歌声不绝，欢笑嬉戏，一片乐园景象。当时，还有不少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文化人”，组织了“文化俱乐部”，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更为青年人所喜爱。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到处传习演唱。每周末组织交际舞会，我们青年人可以步行几十里山路去参加，散场后又步行几十里回来而不觉疲倦。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些老同志一起谈论这段生活，还是不胜其怀念之情。当时大家心情愉快，什么杂念也没有。每日工作与学习革命道理，使我们的生活内容很充实，所以物质生活苦一些，也就不理会了。记得当时每月只有几元边币的津贴，发放后大家凑在一起，买点猪肉和红枣，用面盆煮一大盆所谓“小灶饭”，大家围着吃完为止，而日常就只能是一般的“大锅饭”了。

后来我常想，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能那么心情愉快、无忧无虑地团结在一起？当然，延安不是前方，离火线比较远一些，但主要还是由于那时没有政治压力，大家彼此之间是正常的同志关系。形势总是在

不停地发展变化着，边区周围的军情越来越恶化。胡宗南扬言要进攻延安，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当时有传言说，延安进来了不少国民党特务。康生还说了一句“延安特务之多原不足怪”。这时 1942 年就搞起了“整风运动”及后来的“抢救运动”，不少人被整成“特务”并关起来“审查”，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我们这些青年人面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斗争，一时感到愕然：“革命还有这些问题？”幸好为时不久，只有半年时间，被整的同志们就逐渐得到平反，恢复了正常生活，但那些被整的无辜同志们的心灵是受到了损害的。有的变得沉默寡言，有的积极要求到前线，人们的革命积极性实际上有所低沉。我虽然当时没有挨整，但心中也在想：“怎么这么多特务呢？”

八年的延安生活，是我由青年逐渐成熟的时代。我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的生活，和先期到达延安的姐姐弟弟相比，我已进过党政学校。我也认为搞革命只有到党政大学学习或到前线，才算正式参加革命。因此，到达后不久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曾向父母提出要进党政大学的请求。当时在延安，不少人对技术工作有不安心情绪，认为只有政治工作才是轰轰烈烈。结果，我受到了父母的严肃告诫：“你现在参加革命了。在革命队伍中，一切都按组织决定，不能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我本以为只要他们为我说上一句，我就会如愿以偿的；哪知对干部子弟当时真的是“只有严格要求而没有什么照顾”，于是，我只好规规矩矩去中组部接受分配了。

当时的组织部长是陈云和李富春同志。他们热情地把我当孩子来接待，说：“小鬼，工作已经给你安排了”。要我去医院工作。我想，我还没有说说自己的想法哩，于是提出想去党政大学的要求，并强调，我是学护士的，不会当大夫。可是他们说：“解放区培养三个月或半年就可以工作了，你在正规医院学了 4 年还不能干？”根本不考虑我的意见，我也就不敢再蘑菇了，怀着“必须服从”的心情搬到医院去了。记得过后很久，他们两位老人家见到我时还向人介绍：“这个小鬼，当年不愿到医院工作，还哭了一顿哩！”当我去医院时，父母再三强调，要我真正服从组织分配，努力做好工作，不要三心二意，不准当逃兵，要准备吃苦等要求。可是当我到了医院，真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

当时医院就在一个山坡的窑洞内，号称中央医院，但什么设备都没

有连一台最简单的 X 线诊断机都没有，仅有的一台显微镜还是十分破旧，药品及一般设备也很简陋，听诊器、血压表也是一个病区才有一套。用过的敷料要自己拿到河边去洗，洗后消毒再用。而消毒只有很小的一个高压消毒锅消毒空针，其他都用蒸馒头的大锅。

刚开始时真不知怎样工作，但看到同志们工作得很顺利，也没有人抱怨条件。而奇怪的是，当时的确没有什么病人被感染。手术后创面都是“一级愈合”，所以很快便适应了。我被分配在外科工作。当时分科并不严格，外科兼做妇科手术。在 1940 年初，有一个正式医学院校毕业、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中年大夫也到了延安，他就是外科兼妇产科主任金茂岳。组织上决定我给他当助手。不久，苏联派了一名叫阿洛夫的外科大夫来医院，并带了些器械来，外科与妇科于是分开。我又被决定为阿洛夫当助手，协助他培训各大军区送来的卫生部长。因为那时我已在外科工作了三年多了，有时阿洛夫忙不过来，便由我与他们一起做手术。1942 年底，周泽昭大夫从广西避开了国民党的搜捕，全家到了延安。他是著名的头颈外科大夫。这时，阿洛夫准备回国，周泽昭便接任外科主任，我又跟着他工作学习。周泽昭同志比较重视教学，鉴于当时中央医院从“大后方”上过一二年医学院，但未毕业的，以及像我这样从护校毕业的同志，经过几年工作，有实际经验但无理论基础，所以与延安医大的教员商量，在中央医院办了个医训班由他们及中央医院中的“大后方”来的“专家”讲课，以提高我们的水平。当时的护士一部分是由党政大学调来的学员，有一定文化水平，而绝大多数都是由农村招来的小姑娘，经过短期学习便做护理工作。所以后来又办了护训班，以后又成立了护校，为下边培养护士。解放区的医护人员极少数是“大后方”正式医校毕业的，大多数基本上都是边学习边工作，工作需要时又调回去工作，以后再来学习这样培养出来的。

整个解放区的医院中，中央医院还算条件比较好的。从 1942 年初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由于党中央重视，从“大后方”不断动员一些各类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千方百计从敌占区购买一些设备及药品，也有国外侨胞捐送的。这时的医院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也比较正规了。经过了五年这样的工作与学习，我已能独立工作，自己的信心也愈来愈强，下了决心要做个好的女外科大夫。这是因为当时有一种说法，认

为女同志做外科不合适，不能适应战时需要。我听了很不服气，因而发奋立志要干外科。

延安女同志很少，据说男女人数比例是 18:1。不少女同志很年轻就结婚了，结婚后只能带带孩子，离开工作。我舍不得离开我们的工作环境，于是坚持不结婚，这在当时是要受到舆论压力的。当然，不结婚并不等于没有朋友。既然不能结婚，自然也就不免“告吹”，因之舆论压力也就更大。我就索性一意孤行，工作劲头更大，心中倒也坦然，因为工作给我带来的愉快实在更多。1945 年日本投降 大批同志下山 到刚解放的东北各城市去。我也很想去，但组织上认为工作离不开而不予批准，所以留在延安中央医院继续工作。由于“服从组织”已成习惯，所以也无不满情绪。

四

1947 年 3 月，胡宗南大举进攻，我军“战略转移”以消灭其主力。当时，中央医院一分为二，一部分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一后方医院，随部队行动；一部分人及设备渡黄河到晋察冀边区，成立平山中央医院，接受医疗任务。这一部分都是老弱人员及带孩子的女同志。我未婚，没有任何负担，当然随军行动。当时只有我一个女同志，后来又有一位离了婚但无孩子的女医生给我当助手，其他皆为男同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无比高兴 有点‘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势，一路随着大家行军。尽管当时为了照顾‘技术人员’我可以有‘半匹马’驮东西 但也都让出来驮医疗设备，和别人同样地背上背包行军。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一直坚持在陕北与敌人周旋。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终于被一口一口地吃掉了。

延安保卫战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我们这些从未参加过战斗的人来说，也是够艰苦的。工作条件谈不上，随着部队转移，接受伤员也无稳定住所，都是临时找农家房子从事手术医疗，又经常不断地转移着。手术后的伤员就安置在老百姓家里，有敌情把伤员转到山沟中，敌人走后再抬回来。

当时 我负责一个所的任务 定员 700 名伤员 分散在很多山头 每天要跑很多路去给他们治疗及换药，到很晚才能回到驻地，中午带点干粮，饿肚子是常事。当时，伤员也够苦的。重伤员我们处理后送过黄河，到后

方医院继续治疗。1947 年斑疹伤寒流行，由于没有药，静脉注射盐水的条件都没有，只能皮下注射自制的生理盐水，所以每次不可能大量，怕引起感染，只有让伤员喝大量中药汤水及米汤。不少医护人员也染上斑疹伤寒。我与王文修医生也被传染。他因影响了脑，一开始即昏迷，不久就牺牲了。而我为胃肠型大出血，只能“直接输血”，也不能大量输。由于大量失血，且不易止住，也陷入了昏迷。当时正是敌情紧张，必须转移，同志们都认为我很难活下来了。院领导紧急向上汇报。很快，周总理派罗青长同志及总理警卫员连夜赶到驻地，并用担架立即将我抬到安全地带逐渐止住了血，并送过黄河到我父母的驻地，这是我第二次的九死一生。我的父母告诉我，不是周总理当机立断，派同志接我出来，我是万难幸免的了。对于总理的救命之情，我决心以行动答报。休养两个月后立即重返前线。在后来的岁月中，凡遇到周总理的指示，我必更加尽心尽力地执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1948 年开始，我军转入大反攻。胡宗南节节败退，终于撤出了延安。这时，随着我们行动的三个外国人以及他们在延安生下的孩子也要回国。组织上决定派我护送他们到已解放的石家庄，再转国统区。我也不再返回前方，留在平山县朱毫镇的中央医院接受前线转回来的伤员的治疗任务。这时我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直到 1948 年底。

八年的艰苦战斗以及农村生活结束了，又开始了解放后的城市生活。党中央及时抓住进城前的时机，组织全党进行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并组织学习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以迎接新形势的到来。我也和其他广大党员干部一样，面临这一巨大的转变，既极其兴奋，又十分紧张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放松革命意志的锻炼，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警惕。

不久，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我被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单位的代表，需要先期到达北京。这时，我面临着一个亟待决定的问题，举行婚礼的地点和时间。孙方家是天津一个大资本家家庭，如果进城结婚，张扬纷扰势难避免，还有可能带来一些不利的政治影响。于是决定在进城前，于 1948 年 12 月在驻地从简举行，婚后不久就赶到北京接受新的工作任务。

五

全国解放了。我们这一群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转回到城市的已近中年的人，自身已经起了变化，变成革命队伍中的干部了。进城之后对七届二中全会的教导一直牢记，很怕犯错误。过的是供给制生活，保持了比较艰苦的作风，这些似乎并不难。我一直怀有到大医院去进修的心愿，进城之后便愈来愈迫切。经卫生部领导同意后，我去协和医院商量进修的事。那时协和医院尚未“解放”，卫生部的指示他们并不买账。记得我去协和医院时，教务长接见我还是很客气的，但提出要有正式学历，还要用英语考试等，实际上是拒绝了。自尊心使得我也就没有再去第二次。

后来，卫生部让我到已是卫生部所属的北京医院去进修。我选择了骨外科，在刘载生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了一年多。刘教授认真地教导我，让我自己动手，他在旁辅导，还指定我看一些书籍，有时还找到他家去玩，使我完全消除了陌生之感，并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可惜他后来调去东北，挨了整，患了肾癌而过早地去世了。至今我想起他还很难过。也许是由于我在教会学校做事时接触过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缘故，所以和他们容易沟通，也很愿意接近一些有专长的老知识分子，于是就不断有人提醒我要注意阶级立场问题。

1951年，卫生部决定要成立几个中央直属医院（共6个）决定调我到位于天坛的华北人民医院（后改为中直第一医院）任医务主任兼外科副主任。他们说：“像你这样懂业务的老干部要发挥作用。不在于自己能掌握多少业务，应在领导方面发展。现在刚解放，我们应有一批干部到各医疗单位去参加整顿”。我当时听了虽然不太愿意，但也说不出理由不去，但不甘心完全搞行政管理工作，所以提出了不完全脱离业务的要求。组织同意了，才让我兼一个外科副主任，当时延安来的一位党政干部任党总支部书记。华北人民医院系原国民党战勤医院，规模较大，人员很多，但多是士兵转业过来的人员，也有一些业务人员，因此与北京其他大医院或洋人办的医院及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北京医院等无法相比，在业务水平及设备上都相差很远。当时卫生部的傅连璋同志认为：我们自己应该建设一些医院来完成医疗任务，只靠少数洋医院是不行的。经过卫生部两年多的大力支持，调入一批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并补充了设备，又新

建了一些医疗用房，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医疗水平也有所提高。由于病床较多，所以承担的任务也较重，我由医务主任提升为副院长。外科手术愈做愈少，思想上也认识到我们这些“土包子”业务干部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是“专家”，要发挥作用就应利用自己懂些业务的“优势”搞管理工作，比不懂业务的干部容易得多。一般性的政治口号与宣传是深入不了业务的改革的，这是我从此以后认定的“死理”。要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了解新形势来充实自己，并掌握业务发展的趋势，这样才能使本单位的工作有所进展，才能团结同志。要使业务发展，必须依靠业务人员。这些又是我“右倾思想”的表现，如“重才轻德”、“依靠牛鬼蛇神”、“重业务轻政治”与“不务正业的党委书记”等等的帽子戴了多年，而且一有运动，即成为批判重点。1959年反“右倾”，医科院党委对我进行了批判，并撤销了我总支书记的职务。但我思想上并未改变认识，也未感到难过，也没有认真做“挖根”检讨，也未改变观点，倒还有点“阿 Q 思想”，认为不让我做党委书记更好，免得“政治工作”上不去，要我来负责任。

我的“歪理”就是，作为党委书记，如果本单位业务上不去，干部未培养起来，工作没有起色，口头宣传喊得再响，也不是好的党委书记。我一直不隐瞒我的观点，对只会按上级文件及指示“等因奉此”地照本宣科的“政治工作”不以为然。所以，一直不见谅于某些党政领导，不过这些也一直未影响自己的情绪，直至今日。

如今，我这一辈子的“工作日程”也已基本结束，以上看法仍未改变。我常告诉年轻的领导同志我的经历及观点：只会按着上级文件及指示“一般完成任务”，不能算称职的领导。应该根据自己担当的任务，结合形势发展，不断提出新任务，发展本单位的业务，培养更多的干部，才算完成任务。所以有的领导认为我工作积极能干，有事业心，但就是思想右倾，对此，我至今难以理解。

六

几十年来，和与我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相比较，我的工作调动很少，相当稳定。从 1941 年初到延安中央医院工作，解放前夕到晋察冀边区平山朱毫中央医院，解放后进城在卫生部直属第一医院，1957 年调医科院肿瘤医院，一直在卫生部直属单位工作。优点是稳定，情况熟悉，领导对

我了解。缺点是对其他行业及省市工作经验缺乏，圈子太小，接触的人很有限 知道的事就更有限了。

新中国成立后为更好地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卫生部 1957 年决定建立国际医院，为外交使团人员及家属服务。由于我父亲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我爱人当时也在外交部工作，所以想调我去筹建国际医院。还正在基建之时“大跃进”的气息已经来临。很多专家 包括金显宅、林巧稚、张孝骞、张庆松等 10 余位找我商量。他们认为癌症的严重性已逐渐突出，中国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肿瘤医院。当时要另建一个肿瘤医院是没有可能的，而国际医院为之服务的外交使团人员一般都是健康人，有大病都回国治疗，小病让这些专家来治疗也是很大浪费，所以不如将国际医院改为肿瘤医院。

我很同意他们的观点，也认为国际医院没有多少业务工作可做。因之我们上书卫生部。经过考虑后上级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国际医院正式改为肿瘤医院，我担任副院长、总支书记，但将基建标准降低了。由于当时社会上的恐癌情绪，所以改名为日坛医院，因其正好邻近日坛公园。

1958 年初基建完成，一般设备安装完毕便正式接收病人。从此我便由肿瘤治疗队伍中的新兵，又经过 30 多年而成老兵，并从一个对癌症一无所知的业务干部，成为肿瘤战线的领导成员之一。在这几十年中，很多知识分子积极开展他们的业务，帮助我出点子，我能有点这方面的知识，是与他们在日常业务中接触，并得到他们的指导分不开的。他们之中只有少数搞过一些肿瘤的临床，如外科、放射治疗，多数也是从综合医院调来的，也没有多少研究癌症的经验，但大家对建好第一个专科肿瘤医院的热情很高 立下了“攻克癌症”的决心。在“大跃进”的年代 脑子发热是必然的 对癌症这个难题根本不认识 就大发“豪言壮语”而闹了笑话。当时包括专家都有过“如果对全民进行普查，对查出的早期患者进行治疗，就没有晚期死亡了”的幼稚想法 全民普查谈何容易！也敢抬着“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的大标语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在讨论时还提出“10 年制服肿瘤”，有的人还嫌时间太长。这样闹腾了一年多，虽然发动了群众进行“三早”宣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为癌症防治造了声势 但医院病人治愈得很少。人们说：“癌症治疗不好 治好的不是癌症”。有些领导也怀疑是否需要很多钱，买进口设备装备医院；如果是，还不如专门建一

些为晚期病人“等死”的休养所。而我们这些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及对癌症的不断加深认识，倒也慢慢地明白了：凭一知半解加热情，是搞不出来好事业的，只能阻碍事业的发展。

时间过得很快，三四年过去了。虽然在管理上有些适合肿瘤特点的改进，但在癌症防治研究上进展不大，凭热情的工作方法愈来愈感到不行了。首先感到要学习，但向谁学？向内行学，但专家太少；而他们也闭塞多年，对国外进展了解也不多。当时，医院是“差额补助”制的经济管理方式。钱不多，但还是下决心拨出经费购买中外图书杂志，调整行政办公用房。在行政楼调整了几间房，抽调了几个同志搞图书馆。在那个年代，干什么事总会有人提出异议来阻挡。有人说挤了党政用房，有人提经费问题，还有人说：“有几个人懂外文？花那么多钱为少数人用”。可是我确已感到，不了解国内外情况，不培养人才，肿瘤医院是前进不了的。我们一方面要求懂外文的同志每周开读书会，介绍国外的业务情况，并要求大家学外文，定期在读书会上报告，促进同志们提高外语水平，获取国外情况。但这样做还是缓慢的。由于肿瘤事业不能加速发展，心中压力很大。首先觉悟到的是人才太缺。尽管上级可以拨款买设备，但买了不会用，或者高级设备当做一般设备而造成浪费。有些课题国外开展得很快，但我们没有人可以开展等等问题经常在我脑中转。于是想到非抓人才培养与设备不可了。组织分配来大学生，不管医院任务多重，也送到国内其他医院去学习，并制订了每个人培养计划，在院内各科轮转学习，以使他们对癌症有全面了解。

现在看来 60 年代初期分派来的大学生，由于受过有计划培养，他们的基础都比较好，成为今日的骨干。另一方面，想方设法从外面调入一些业务干部。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一些政治或家庭有些“问题”的干部，常被一些单位做为送出的对象；或者本人感到心情不愉快，希望调到其他单位。为调进一些有才的同志，在我们领导班子中常有异议。有人说：“只要有本事，她什么都要”。有的人还向上级反映“这样的人她也要调来，我们医院成了收容所了”。但我是党委书记，还是坚持调进了一些业务干部。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真是横了心了。1959 年被批为“右倾”撤了职 并经常被议论为“一个人说了算 独断专行”、“不尊重党的领导”的帽

子是经常戴着的。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被升级为“走资派”批判，并遭到人身攻击，肉体打击。说实话，不知为什么，我对被横加的指责并未感到多大压力。在当时，有的人总是想方设法要把某些有用之人调走，只是当时各个单位都无法调入。结果“文化大革命”来了，正好借此机会，将大批人才“下放”出去。这些我都看在眼里，由于自身难保而只好坐视。后来“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再一次见到了周总理，立即向他老人家反映了这个“人才下放”的问题，当即得到他的支持。不但下放的同志绝大多数被调回，还从别的单位下放的人中，又调了一部分同志来到我院。我院业务干部队伍马上得到了充实。

调进来的业务干部多数是未从事过肿瘤工作的。除了向书本学习外，也没法提高。很想送他们出国学习，在接触来访的西方学者时，也向他们探问过，他们很愿支持，但多数年轻人外文不行。这时，正好调入一位外语学院毕业生吴甘美。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我们就办起脱产外语班，当时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有人说：“你胆子真不小，也不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外语班坚持办了三期，使一些同志的外语水平有所提高。在第一次卫生部考试出国业务人员时，我院 50 多人应考，只有几个落选，所以初期送出国的人员我院占多数。

自从 1957 年调入肿瘤医院以来，我作为对肿瘤一无所知的新兵，虽也整天动脑筋，想把肿瘤治疗工作搞上去，但进展不快，舆论压力也很大，一时说什么的都有。“有没有必要搞这个肿瘤医院？”“外国人搞了近百年，至今还未解决……”议论很是不少。所以，“文化大革命”一来，首先要砍掉的就是肿瘤医院。当时的上级已作出“解散肿瘤医院”的决定，连人员如何安排，设备如何分配都已有了方案。“四人帮”的部委代表人物的决定谁又能推翻？又是周总理救了肿瘤事业。我当时将要解散肿瘤医院的决定向周总理作了反映，总理很气愤地说：“肿瘤是常见多发病。我们要研究它，不能取消，要树雄心壮志，攻克肿瘤嘛！”当时卫生部的军代表也在场。我心中真是又感谢又激动，可是一点也不敢形之于色。

回院后，我就急不可待地将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同志们，并很快找到我们的军代表，请他指示怎么办。军代表说：“既然总理有指示，你们讨论拿出方案来”。现在回想，当时真是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样，理直气壮地串联了一些热爱肿瘤事业的院内外同志。大家经过了近 10 年的“碰来碰

去”自然心中都有不少想法，认识很快就统一了，就是“不能洋人咋搞，我们一定也咋搞”，必须根据我们的情况，来讨论防治研究的战略方针。因此，上书卫生部军管会，要求召开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一经批准，就于1969年秋在天津召开了。会议由当时军管会主任谢华同志主持，全国各省市及军队都有代表参加。会上传达了总理振奋人心的指示，既交流了近10年的工作经验，又统一了对癌症防治的重要性的认识与今后工作的战略方向。这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防治癌症的动员大会。在组织上加强了领导，在卫生部领导下的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成立了，我被任命为主任，并另有几个大省、市（上海、天津、广东）的肿瘤医院院长为副主任。在这次会议上，经过热烈讨论，制定了奋斗目标，并将全国发病较高的几个重点肿瘤、基础理论以及中医中药等课题，分别组成了13个全国性的协作组，每一个协作组都有专家负责组织讨论，并制订防治计划。会后，全国就这样动员起来了。我跑了很多省、市，向当地主要领导汇报癌症在我国的严重情况和周总理的有关指示，要求他们支持肿瘤事业。之后，很多省、市在当地领导的重视及肿瘤专业人员的热情支持下，相继成立了肿瘤医院或研究所。有的高发地区及高发县也成立了专门的肿瘤研究防治机构，如食管癌、肝癌、鼻咽癌等研究机构。当时真是蓬蓬勃勃，发展很快，并经常开经验交流会，推广某些地区的先进经验或组织全国性协作开展某项研究，如食管癌、肝癌、乳腺癌和绒毛膜上皮癌等的诊断、治疗以及某些有效药物的推广使用等。

从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成立到70年代末，做了大量工作。防治癌症取得不少进展，由群众自发搞起来，到被国家科委及卫生部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并给以各种支持。卫生部主管领导曾多次对我说：“癌防治办”的工作与其他各“办”相比，最有进展。实际上真是群众积极性很高。有的地区领导不重视，群众就在本单位的综合医院内成立肿瘤科，自己先干起来。群众对肿瘤事业的热心大大教育了我，坚定了我为癌症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否则就是辜负了群众的热情。

尽管肿瘤事业在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想一步，心中无底。到底中国癌症事业怎么搞？经过十几年的经历，大家都已认识到癌症研究是十分复杂的、科学性很强的课题，决不是我们当初的喊口号、凭热情的幼稚做法所能解决的。而我国癌症事业起步晚，